

目錄

前言

——

〇〇一

《資治通鑒》導讀

——

〇〇四

戰國至秦

引論一

——

〇二八

一、長平之戰

——

〇三六

二、秦皇暴政

——

〇五六

兩漢

引論二

——

〇八二

三、陳平安漢

——

〇八八

四、張騫鑿空

——

一二二

五、巫蠱之禍

——

一三八

六、充國屯田

一五九

七、漢末清議

一八八

三國兩晉南北朝

引論三

二一四

八、赤壁之戰

二二〇

九、北魏漢化

二五三

隋唐五代

引論四

二七〇

十、世民弑兄

二七五

十一、劉晏改革

三一九

十二、割棄幽燕

三三三

附錄

一、參考書目

三六八

二、名句索引

三七一

前言

一部洋洋數百萬言的經典如何誕生？怎麼可能有人願意花費數十年的時間和精力去完成一部著作？這實在讓生活於快節奏時代的讀者疑惑、驚訝。事實上，世間很多巨大的文化工程，在開始時並不一定有完整的計劃和良好的條件。《資治通鑑》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國史學名著。但是，作者司馬光最初創作《資治通鑑》的構想，原來只是要提供一部貫通古今、可讀性強的歷史讀物，給讀者做人處事作參考。

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的歷史書籍可稱得上「汗牛充棟」，讀書人無法輕易汲取歷史知識，故此，司馬光希望對這個問題有所補救。經過前後近十年的努力，他終於獨力完成了上接《左傳》，下迄秦末的八卷本《通志》。其後，司馬光獲得君主的鼎力支持，終於再用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來完成自楚漢相爭到宋朝建國前夕的一段歷史。然而，正因得到朝廷的贊助，這部書從原來為一般讀者服務變為專門為統治階層提供「有益治道」的史學「巨著」，一方面讓它成為譽滿史壇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導致它的內容極之厚重，必須花費極長時間才能通讀一遍。據司馬光自述，這部巨著只有他的一位官員朋友王益柔（字勝之）能夠通讀，其他的讀者總在閱

讀不久後便放棄。因此，這部可讀性極高、充滿可供借鑒的經驗的著作卻難以覓得知音。

時至今天，要讀者通讀這部三百多萬字的巨著，已經極為困難；若還要兼看宋末胡三省精彩詳確的注解¹，更是近乎不可能。據記載，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司馬光曾將全書刪撮為八十萬字的《通鑒舉要歷》，可惜這部精簡的著作沒有流傳下來。今天，我們要細讀全書，在時間上和精神上恐怕非一般讀者所能負擔。即使是專門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學者，也未必有耐性去通讀全書。清代學者王鳴盛曾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究竟這是一部「不可不讀」的經典，還是將之「束之高閣」，兩者能否調和，便要考考我們的讀者了。

古代帝王面對着數之不盡的奏章，通常都需要文學侍從將其要點撮寫，用黃紙貼在封面上供皇帝閱覽（例如在明代，這項工作由內閣大學士負責）。仿照這個方式，將一部精彩的經典著作給現今讀者做一點輔助，也是可以的。本書正是朝着這個方向來對《資治通鑒》加以處理。《通鑒》是一部編年史，如何從中獲得較為連貫的歷史經驗，絕不是一蹴而就的。南宋有位官員叫袁樞，他為了方便閱讀，將《通鑒》「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記了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這個作法，方便了一些讀者，後來也有不少學者加以仿效。今天常見的這類紀事本末體史書共有

1 注文字數與正文相近，在本書間中引用，稱為「古注」，以別於近人或筆者的注解。

九種。袁樞的工作受到章學誠和梁啟超等大史學家的稱讚，認為是「化腐朽為神奇」的舉動。可是，由於袁樞此項工作只是為了自己讀《通鑒》時的方便，史識也不甚高明，故司馬光原著的優點並沒有完全保留下來，這是十分可惜的。所以，較嚴謹的讀者都寧願閱讀原書，而不去看袁氏的《通鑒紀事本末》。

此次，我們也並不打算重新將《通鑒》撮寫一遍²，而是按照司馬光的原意，以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等四個要素為重心挑選篇目，幫助讀者了解歷史脈絡並把握《通鑒》特色。由於所選題材圍繞以上四個重點，故本書將戰國至五代合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按照傳統習慣，劃分為戰國至秦、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等四個歷史大段落。每個大段落先行撰寫一篇引論，以通述全段歷史發展趨勢，作為讀者閱讀各個課題的背景資料。每時段的選題數量不等，一方面是必須考慮時代的先後和本書的篇幅限制；另一方面也將四個標準貫穿全書，以供讀者參考，故難免有畸輕畸重、掛一漏萬的毛病。這方面的工作，前輩學人雖有不少可供參考的經驗，但仍需筆者仔細斟酌和修訂。

2 筆者認為我們其實另需一部貫通古今的歷史，因宋代以後的事情也需要補上，即包含宋、元、明、清以至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按編年史的寫法而再加變通和精簡，以適應今天讀者的需要。或可稱此書為《中華通鑒》。

以下便讓筆者介紹司馬光的生平和一些關於編纂《資治通鑑》的資料，以加深讀者對《資治通鑑》的了解和閱讀本書的興趣。

一部經典的誕生

——《資治通鑒》導讀

張偉保

一、史家的絕唱：《資治通鑒》的編纂經過

（一）背景

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年），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縣令，於是便取名「光」。年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極為喜愛，從此便深嗜史學，手不釋卷。仁宗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年），司馬光舉進士甲第，歷任奉禮郎、大理評事，入為館閣校勘、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等職。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馬光撰成《戰國迄秦八卷》《通志》進呈，獲英宗皇帝的嘉許，特命設局續修。神宗即位，因其有益治道，故賜名《資治通鑒》。其後，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馬光竭力反對，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復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專心編纂《資治通鑒》，直至元豐七

年（一〇八四年）成書。哲宗嗣位，由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人京主持國政，數月間盡罷新法。司馬光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傳世著作包括《司馬文正公集》、《資治通鑑》、《通鑑目錄》、《通鑑考異》、《稽古錄》、《涑水紀聞》、《潛虛》、《切韻指掌圖》、《太玄集注》等。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兼具《左傳》和《史記》的優點，在中國史學上佔有非同一般的位置。而《通鑑》的編寫，雖也曾受帝王的鼎力襄助，卻無異是一本私家修撰的巨著。這種情況，與歷代官修史籍大相逕庭。民國史學史專家金毓黻教授曾經指出：「試考（司馬）光自言及劉恕所述，其蓄志修史，非一日矣。及承英宗之命，乃得實踐其言；且官修諸史，皆取稟監修，任編纂者往往擱筆相視，含毫不斷，而光之修《通鑑》則無是也。編纂之役，統由自任，上無監修之牽制，下無同輩之推諉，二劉（恕、攽）一范（祖禹），則悉取光旨，其任助役，有相濟之美，無意見之差，故撰人獨署光名，而他人不得與。雖云近於官修，而與向來之官修者異矣。」¹因此，這部史書並不可以官書視之，其實是一部曠代巨著。即使後世不斷有續編和改寫，但直至今天，這部著作仍可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經典著作。

中國較早的敘事詳盡的編年體史學著作是《左傳》，它是魯國史官左丘明在孔子逝世後，因恐弟子們錯誤理解孔子編纂《春秋》的宗旨，遂利用史官的特殊角色，努力收集各國的歷史

1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第一八二頁。

文獻，對《春秋》加上詳細的補充，終於完成了一部傑出的編年史——《左氏春秋》²。千餘年後，宋代歷史學家司馬光在年青時已經非常喜歡和熟習《左傳》，並立志要續寫一部自戰國至五代、繁簡適中的編年史。

原來，自魏晉南北朝以後，史部典籍急劇增加。下及宋代，隨着文化知識的日趨普及，歷史典籍仍不斷膨脹。面對汗牛充棟的史籍，任何勤奮的讀者，即使終其一身，也難以完全通讀一遍。特別是自班固《漢書》出現以後，無論是紀傳體的歷代「正史」，或按時間順序撰寫的編年史，絕大部分都是「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即使貫通數代的《南北史》或《十六國春秋》等史籍，也都只是局限於一個較長的時段，再沒有出現如司馬遷《史記》般貫通古今的歷史巨著。

（二）創作動機和前期工作

今天看來，《通鑑》的讀者並不僅僅是帝王，一般的讀書人讀《通鑑》也會大有收穫。在司馬光的心中，當時讀書人的歷史知識也極為貧乏。事實上，自南北朝以來，像《史記》一般貫串古今的著作已絕無僅有。同時，紀傳體正史在史事安排上，同一事件的記載往往過於分散，

2 按：又名《春秋左氏傳》，世人多稱之為《左傳》。

讓人難獲完整的印象。若要在其中總結出可以借鑒的經驗，十分困難。因此，一般的情況是只選讀「前四史」。對三國以後的歷史，學者往往茫然。部分人對唐史有較大的興趣，在當時已屬罕見。

對此，司馬光反覆思量，曾感慨地說：「《春秋》之後，《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盡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因此，「常欲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要完成這部偉大著作，在人力和圖書資料兩方面必須具備良好的條件。為了實踐其宿願，力求打破斷代史的局限，以便讀者能夠更有效地「以史為鑒」，司馬光在四十多歲時撰寫了上起戰國，下迄五代的《歷年圖》，並在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年）進獻宋英宗。這部書共有五卷，內容以大事年表形式展示，把中國千百年間的歷史變化加以簡明扼要的介紹。這是司馬光第一部歷史著作，也標誌着他的終身事業正式展開。在這個基礎上，司馬光開始撰寫了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〇三年）到秦朝滅亡的歷史，名為《通志》。這本著作事實上便是《資治通鑒》的前八卷。到了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馬光再向英宗進呈了《通志》八卷，並表示「自少以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國家之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

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編為一書，名曰《通志》」³，希望獲得英宗的支持。不久，英宗命司馬光設局於崇文院，自行選擇協修人員，進行其修史工作。稍後，神宗嗣位，司馬光多次為神宗講述《通志》，深得這位年青皇帝的稱許，認為司馬光這部書「有資治道」，特賜名為《資治通鑒》。他並預先寫了一個序文，命令待全書完成後收入書內。

現在看來，《通鑒》以編年史方式呈現繁複的史事，較紀傳體的史書有較多的優點。首先，以時間為序，史事先後本末較紀傳體史籍為清晰。司馬光又參用《左傳》多元化的敘事方法，故讀者較易掌握事件的發展脈絡。有學者就《通鑒》編排上特別指出：

本來有若干同一事情的材料，是分見於多處的，《資治通鑒》都依次把它們列在一起，而且有的相當集中。例如人所共知的「赤壁鏖戰」，這次戰役的記載，既有一些見於《後漢書·劉表傳》，又有好些散見於《三國志》的魏武帝紀，蜀先主傳，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以及孫權、周瑜、魯肅、張昭、黃蓋等傳，還有些雜見於其他著作。假如我們要了解這次戰役的本末，勢非遍讀上述的紀傳不可，而且就是都翻看過了，由於太亂太雜，也未必立刻能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詳細經過。但《資治通鑒》把這件傷腦筋的問題解決了，它不但把所有涉及「赤壁鏖戰」的記載都集中在一起，而且還加以剪裁、穿插、寫成一篇

整潔而生動的故事，看起來既不覺得頭緒紛繁，也毫無厭煩之感。它這種功夫，對於讀者節省翻檢的時間，幫助是很大的。⁴

因此，當《通鑒》順利完成後，便立即成為史學著作的典範，受到歷代學者的共同讚許。

（三）撰寫分工情況

司馬光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政治家。今人評論其政治立場多偏於保守，深致不滿。但是，若論及其撰寫的《資治通鑒》，則幾乎是眾口一詞加以極度的稱許，以為是史家的極則。⁵我們通過他所撰寫的兩篇奏章和其助手劉恕的〈通鑒外紀引〉追述其早年言論為例，以考察司馬光對《資治通鑒》的創作歷程的自述。這類自述式資料對了解《資治通鑒》的價值有所幫助，十分接近「口述歷史」的本質。

最早出現關於《資治通鑒》的材料是劉恕的〈通鑒外紀引〉，它雖寫於元豐元年（一〇七八

4 聶崇岐《〈資治通鑒〉和胡注》，收於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論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頁二八六。

5 對司馬光《資治通鑒》加以全面否定的著作，可以李則芬《泛論司馬光資治通鑒》（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版）一書為代表。李氏主要不滿司馬光的政治觀點過於保守，引致不少弊端。

年），但其內容卻包含了宋仁宗嘉祐（一〇五六——一〇六三年）初年關於司馬光的一則談話。劉恕首先評論宋代讀書人疏於史學。他說：

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墮。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寢微矣！

這段話可能是受到司馬光的影響，劉恕也自稱是「司馬公門生」。之後，他引述了一段司馬光的話，反映司馬光早在嘉祐初年已有志撰寫《通鑒》。司馬光對劉恕說：

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趙魏韓為諸侯，下訖（迄）五代，因丘明（《左傳》）編年之體，仿荀悅（《漢紀》）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書。

這是有關司馬光準備編纂《通鑒》的一則珍貴資料。他的創作動機也很單純，是希望為讀書人提供一部長短合宜的史籍。過了差不多十年，即宋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司馬光

「以學士為英宗皇帝侍講」，遂以他初步完成的《通志》充當歷史教材，深受英宗的稱賞。隨即「詔修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蹟》，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司馬光引薦了劉恕，並稱「專精史學……唯劉恕一人而已」。司馬光又說：「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諉之，光仰成而已。」⁶

事實上，司馬光能夠完成這項宏大的工程，當然非單憑個人的力量。英宗除了表示支持外，更提出讓司馬光「擇史館英才共修之」，以繼續進行有關的編纂工作。但司馬光卻婉拒了英宗，並選用自己認為合適的青年史家劉恕（字道原）、趙君錫作助手（按：因適值趙氏喪父，未能入館，故改任精於漢史的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字貢父）代替。）到了熙寧四年（一〇七一年），攽因出為泰州通判，司馬光又薦用知資州龍水縣范祖禹（字純甫）代之。據資料顯示，劉攽其後仍繼續參與《通鑑》長編的隋代以前部分。⁷

除劉恕外，兩漢部分主要由劉攽負責，二劉亦共同負責魏晉至隋代的長編工作，而唐代則由於史料繁多，由范祖禹總其成。由於范氏乃後來加入者，故司馬光曾寫信指導其工作，反映通鑑長編的編纂安排。司馬光《答范夢得》書說：

6 引文出自司馬光《資治通鑑外紀序》。按：司馬光的言論一方面反映其謙遜的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劉恕對《通鑑》貢獻極大。

7 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學研究》，第二七六—二七七頁。

附注（按：指叢目。）俱畢，請從（唐）高祖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⁸。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收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唐高祖年號，六一八—六二六年）以後，天祐（唐哀帝年號，九〇四—九〇七年）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

此書函詳細交待叢目和長編的具體編纂辦法，又寄去「貢父所作長編一冊」、「道原廣本兩卷」供祖禹參考。由此而言，此時三人的分工十分清晰。雖然三人是各有職分，其中以劉恕出力最多，全祖望作〈通鑒分修諸人考〉有云：「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

其後，劉恕逝世，分工略有調整。司馬光之子康（字公休）曾對晁說之言：

《資治通鑒》之成書，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父），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純誠粹識、不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幾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辜所志也。⁹

8 原注：以備剪開粘綴故也。

9 晁說之《景迂生集》卷十七：轉引自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學研究》，頁二七八。

(四) 獨任刪削全書的大權

除了最早完成並送呈宋英宗的《通志》為司馬光獨力完成外，自楚漢相爭以後的部分，也均由其獨任刪削工作。在與宋次道的信中他曾指出：

某自到洛陽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鑒》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祖禹）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至今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¹⁰

誠如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撰一言」。司馬光著《通鑒》也極相似，雖然長編由各助手負責，但最後的刪訂全由司馬光一人負全責。劉義仲（劉恕之子）《通鑒問疑》曾說：

先人在局，止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¹¹

全書的初稿（長編），基本上由各協修人員負責，再由司馬光總其成，包括「對於全書的

¹⁰ 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卷一九三，第一六三四頁。

¹¹ 劉義仲《通鑒問疑》；轉引自陳光崇《通鑒新論》，頁一五五。

體例、書法，以致史料的考訂，文章的剪裁」等方面。此外，更以「臣光言」對重大事件加以評論，讓其歷史觀貫串全書。（按：這是繼承了《左傳》的「君子曰」、《史記》的「太史公曰」的方式，突顯出作者難以替代的地位，亦即史遷所說的「成一家之言」。）這種作法，完全避免了前代官修史書「責任不明，互相推諉」的毛病。

除了受到宋英宗的支持外，《通鑑》的完成和流傳也是宋神宗賜予的恩寵。神宗在「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十月初開經筵，（光）奉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臣光初進讀，面賜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這就是著名的《資治通鑑序》。（序）文說：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鑒戒於後世者也。……英考（按：宋英宗）留神載籍，萬機之下，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成烈王，訖於五代……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咸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詩》云：「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

之志焉耳。¹²

司馬光視神宗賜〈序〉為個人極大的榮譽，遂上〈謝賜資治通鑒序表〉，自述其早年立志修史的志趣，並獲得英宗皇帝的支持。他說：

臣性識駑鈍，學問空淺，偶自幼齡，粗涉羣史。嘗欲芟去蕪雜，發揮精雋，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鑒。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摭舊聞，遂伸微志。尚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之便。

未幾，英宗歿，神宗繼位。由於是奉詔編纂的作品，故司馬光隨即將經修訂的《通志》八卷¹³送呈御覽，再獲神宗稱贊，「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秩」，對此書高度贊賞。神宗〈序〉讀此書「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司馬光認為這種殊榮，即使「周之南、董，漢之遷、固，皆推高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特紆

¹² 按：序文據說是王珪的手筆。王珪，字禹玉，慶曆二年（一〇四二年）進士，曾任知制誥、參知政事等，外孫女為著名詞人李清照。

¹³ 按：根據神宗序文內容，此八卷大概即為今本《資治通鑒》的首八卷。

宸翰，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樸小才，固非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事實上，《通鑒》因獲神宗親自賜序，後來才能避過新黨的攻擊和免於燬版之災。

二、貫串百代的巨著

今天看來，這部書的讀者並不僅僅是帝王，即使是一般的讀書人也需要《通鑒》。正如司馬光所說，《通鑒》這部上下千百年的巨著，一方面力求刪繁削簡、上下連貫，以讓人君在日理萬機之餘，也能夠廣泛閱讀歷史，並「以史為鑒」，豐富其治國經驗；另一方面，他更期望借用歷代史事，幫助帝王學習「致治之道」。其中，司馬光多次指出，治國之道不外以下三者：「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¹⁴。而德行爲統治者所必須具備的素質，故提倡「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通過不同的歷史經驗，以了解「治亂存亡安危之本源」。

由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到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年）十二月，上起戰國，下迄五代，共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巨著終於完成。在〈進書表〉中，司馬光詳細追述此部經歷二十多年的作品的撰寫經過和內容重點。他說：

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入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闡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

15 一般以治平三年到元豐七年（一〇六六—一〇八四年）為《資治通鑒》的編寫時期，共十九年。其實，若計算《通志》八卷初稿的編寫時間，本書寫作歷時二十多年，甚至可能在嘉祐（一〇五六—一〇六三年）初年已開始，即前後合約三十年。《通志》乃司馬光以一人之力去完成，故需時較久。

海，挾撻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臣今眩骨腹痺，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他如實地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這部堪與《史記》匹敵的《資治通鑒》終於完成了，所謂「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古人著述，死生以之，觀兩司馬在完成其巨著後，均曾發出相似的聲音。《老子》所說「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概正是這個道理。